

邓小平领导我们改革开放（谷牧）

回顾“大包干”联产承包制产生与发展（王郁昭）

目击伟大转折的序幕（傅崇碧）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次特别会议【节录】（于光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苏维民）

历史转折关头的叶剑英（范硕）

陈云在中纪委恢复成立前后（张嘏）

邓小平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稿起草经过（韩钢）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是怎样发出的？（王强）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夏春珍）

19 | 读·党史 第19辑



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

汪 然/编

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

19 | 读·党史
第19辑



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

汪 然/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 汪然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1 (2014.4 重印)

(读·党史)

ISBN 978-7-5098-2531-0

I. ①中… II. ①汪… III. 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 (1978) —史料 IV. ①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4823 号

启事: 本书选用的部分文字、图书, 来源于各正式出版物。其中还有部分作品尚未与有关作者、编者取得联系, 我们深感不安。恳请有关权利人联系我社, 我们将按《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支付稿酬。
(联系人: 贺冬英 电话: 010-82517196)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潘 鹏

复 审: 吴 江

终 审: 赵建忠

责任校对: 龚秀华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北京东方资治文化传播中心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字 数: 116 千字

印 张: 5

印 数: 5001—10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531-0

定 价: 12.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北京东方资治文化传播中心发行部联系
电话: 010—51631911

目录

CONTENTS

► 综 述

- 1 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汪敏

► 回 忆

- 110 邓小平领导我们抓改革开放 /谷牧
61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梁灵光
93 回顾“大包干”联产承包制产生与发展
/王郁昭
73 目击伟大转折的序幕 /傅崇碧
47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次特别会议
(节录) /于光远
78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 /苏维民

► 人 物

- 70 历史性转折的起点——邓小平与十一届
三中全会 /龙平平 文轩
12 历史转折关头的叶剑英/范硕

121 陈云在中纪委恢复成立前后 / 张曙

▶ 专 论

8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 龚育之

54 中国共产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
/ 曲青山

▶ 史 事

25 邓小平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稿起草经过 / 韩钢

29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
成过程 / 程中原

▶ 钩 沉

103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是怎样发出的？
/ 王强

▶ 视 野

129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夏杏珍

▶ 链 接

141 历史文献中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 漫 笔

146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苏联如何评价中国
的改革开放 / 段炼

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汪敏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早就对“四人帮”极其痛恨，希望尽早结束内乱，把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党中央首先着手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取得一定成绩。揭批“四人帮”，必然联系到十年内乱造成的冤假错案，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进行平反，特别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成为广大干部群

众的强烈要求。

然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观点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

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

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1977年7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

“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科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总结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978年二三月间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在此同时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

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由于20世纪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个人崇拜仍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拨乱反正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揭批“四人帮”，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

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碍，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在广大干部群众对拨乱反正的强烈要求下，一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挣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不同场合讨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并酝酿撰写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

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站在讨论前沿，踊跃参与。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真理标准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处理拨乱反正中遇到的问题。组织部门放手地平反冤假错案，提出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什么人批的，该平反的都要平反；一些工业部门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恢复了一些过去曾遭批判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农村工作中，一些地方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大胆地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在一定范围内纠正多年来农村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

拨乱反正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思过去的曲折，考虑未来的出路。党内开始酝酿对社会主

义的若干体制进行改革。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同志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9月下旬，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当“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刚被冲破时，对我国发展的紧迫性和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很深感受的邓小平，先是在最高领

导层内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随后，又到部分省市，与地方领导谈他思虑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声势。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行程数千里，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地结束，转入正常工作，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的既定议程没有提到已经展开的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及大会会场

真理标准讨论和党内外普遍关心的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对此，许多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的同志很不满意。陈云率先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接着，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讨论。经过思想交锋，会议要求确立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

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应当结束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及时地、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九人为中央委员；选举出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时，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

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这次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由于一系列的根本性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

域的拨乱反正从这次全会开始全面展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从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正式开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

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

目击伟大转折的序幕 /傅崇碧

1974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我自林彪、江青一伙炮制出台“杨余傅事件”冤案,被送往沈阳丧失自由7年之后终于回到北京。1975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使我重新获得为党工作的机会,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从领导高层的角度参与和目击我们党和国家如何度过1976年前后的非常时期,以及在邓小平同志

领导下最终得以实现伟大转折的宝贵机会。

非常时期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忙于军区工作,住在西山,很少回家。接到讣告,我赶往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进了东交民巷,路上的许多人都放声大哭,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坐在车上掉了泪……周

总理遗体火化那天，我和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当时，第一政委为纪登奎，司令员为陈锡联）从军区赶去。从八宝山到北京医院，长街两旁群众肃立，上百万人伫立在寒风中为周总理的灵车送行，一直到很晚，群众都不肯离去。那天军区小食堂做了饭，许多干部都没去吃。15日，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根据周总理的遗嘱，将总理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

1976年9月9日晚上，军区机要员送给我一份机密文电：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当时消息属于绝密，不准讲，要到第二天上午9点钟听广播。我悄悄告诉了张爱萍和王震同志。我们的心都无法平静。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出生入死一辈子革命的红军老战士，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和迫害，但是，对毛主席深厚的热爱、敬仰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人民大会堂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我们只被允许列队看看，给毛主席守灵都不让我们去。许世友司令对“四人帮”非常恼火，曾愤怒责问

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的老同志去给主席守灵。毛主席逝世以后，局势相当紧张。许世友司令住在京西宾馆，他来医院看望老同志，悄悄地告诉我们说，江青一伙开会定了新的党中央人选，上海帮的人都到京西宾馆了。你们要注意，“四人帮”通知你们开会不能去，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他说：“我带了枪，他们要抓我，我就开枪，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我明天就回南京，不在北京这危险的地方。”许司令这样一说，我们的心情也紧张起来，韩先楚、皮定钧、王震等同志都说，我们也要准备防身武器，以防万一。叫我们开会时先请示老帅，老帅不表态我们就不去。

我从医院坐车到西山叶帅家中，把许司令讲的情况向叶帅汇报了。叶帅说，“四人帮”一伙在人民中积怨很大，他们要捞棵稻草，却没捞到什么。叶帅还说，要斗争，但要注意斗争方法。他说完之后就弹钢琴去了。我看叶帅是挺乐观的。叶帅还告诉我：“以后不要来这里



傅崇碧

了，王洪文住到了离我不远的地方在监视我，我离开这里到玉泉山去住，有事来玉泉山。”叶帅指示，掌握好部队的情况，防备“四人帮”搞鬼，并准备应付非常情况。我告别叶帅出来后，在门口遇见肖华和粟裕同志，他们也是来找叶帅的。

我回到301医院，把叶帅讲的情况告诉了韩先楚、皮定钧同志，他们也心中有了数。过了一个星期，叶帅找我去玉泉山。到了玉泉山，我看到聂帅也住在那里。不到10分钟，李先念副总理也来了。叶

帅和聂帅问我部队干部战士的情况怎么样？对“四人帮”有什么看法？我说绝大多数干部对“四人帮”“揪军内一小撮”和想搞乱军队的倒行逆施不满。两位老帅让我很好地掌握部队，对江青在北京军区部队接见、照相、谈话的干部多做工作。

1976年10月6日，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叶帅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再度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恢复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此后不久，叶帅和邓小平同志先后找我谈话，要我在北京军区工作再兼一段卫戍区工作，用8个月到1

年时间，整顿卫戍区。小平同志说：

“你百分之四十力量搞卫戍区整顿，百分之六十力量放在军区。”

1977年9月12日，中央军委任命我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相隔11年之后，我第二度出任卫戍司令，心里很不平静。

在我重新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期间，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找我谈话，对卫戍区工作做了许多重要、具体的指示。一次，小平同志找我谈话，对吴忠任卫戍区司令时的工作提出了严厉批评。我说：“您的讲话对卫戍区工作很重要，我回去作传达，不如把卫戍区的领导带来，请您亲自给他们讲，这样力量就大了。”小平同志说：“好！”于是，我把卫戍区的七八个领导都带到小平同志家里，小平同志讲到卫戍区在四五运动中的工作发了火，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当时出现的整干部、抓人、镇压群众等问题，让他们回去做检讨。他们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拨乱反正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即“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以此作为全国处理一切事情的指导思想。

1977年3月，胡耀邦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他组织修改、审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随之予以转载。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全国性的大讨论。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带头撰文或发表讲话，从党的历史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

1977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十一大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初步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调动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限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十一大从根本上说没有能够从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参加了这次长达36天的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主持，原定讨论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及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等问题。由于邓小平同志在此前提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已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赞同，因此先讨论从1979

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在11月1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同志在发言中大胆提出：进行工作重心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1976年天安门事件、“文革”中“二月逆流”等问题。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详细谈到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影响大、涉及面广的问题。陈云同志的讲话使各组发言空前活跃。大家一下子把会议的预定主题扭转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研究了与会者的强烈愿望，并据此作出了正确的处理意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

1.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
2. 撤销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全部文件。
3. 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
4. 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

5. 康生、谢富治有很大的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

6. 对于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7. “三支两军”问题，成绩要肯定，出现的错误由中央承担责任。

（选自《纵横》

2000年第4期）

历史转折关头的叶剑英 / 范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全会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开辟了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是与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本文侧重记

述叶剑英在这次会议前前后后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力争邓小平复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6年10月6日晚，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从而结束了十年内乱。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派人把这个特大喜讯通报给一直被“软禁”